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瑟

太古神游

——音乐考古与史前史

■王子初

读中国音乐的史前史，无异于太古神游。中国音乐史学始终没有建立起可以看作为“信史”的史前史。

传统中国历史的“信史”时段很晚，一般以西周共和（公元前841年）为界。今天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对应于中国自远古直至夏商的漫长时期，历史学家称之为“传说时代”。20世纪20年代后期，对殷墟的发掘证明了商代的确切存在，使商代走出了“传说”的范畴。但迄今的夏代，仍难彻底揭去其“传说”的外衣，确定无疑地指出考古学上的“夏墟”所在。不乏有学者主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夏墟；但毕竟还是缺少直接的证据，尤其是夏代文字的证据。中国历史的现状如此，中国音乐的史前史也难以挣脱这一认识上的桎梏。

中国历史上音乐的地位显赫，历代帝王功成必先作乐，无一例外。古代中国却并无系统的“音乐史”著作，一部《二十四史》，于天道神祇、帝王将相、政治经济、武功文治之林占有着一席之地的《乐志》《律志》，加上若干诸子杂集的相关内容，就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史”的主体。相关夏代及史前音乐的记述，如《吕氏春秋》的“古乐”“音初”“侈乐”“大乐”“适音”“音律”等篇章，为传统音乐史家屡屡引述的“史前史”主要内容。如关于“律”的起源：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①]。

又如乐器瑟的发明：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还有乐曲的创作：

甘肃永登乐山坪彩陶鼓陶鼓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296号墓铜铃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糸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②。

音乐史前史的一大命题，是人类音乐艺术的起源。无论是哲学家、美学家或是音乐史学家，总想弄清楚“音乐是怎样产生的？”这一似乎永远也弄不清楚的难题。对于音乐史学家们来说，乐律的起源问题更让人手足无措。黄帝如何忽然有了创造乐律的欲望？伶伦创造乐律何以要去“大夏之西”？乐律，原本是人类对音乐中乐音系统的数理归纳，这与传说中的凤凰神鸟又有何干？再如“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字里行间，不时透射出人为编造的蛛丝马迹。今日考古所见的金属乐器，最早为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296号墓的红铜铃，其后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3枚青铜铃。它们的时代已属龙山文化晚期，相当于传说中的夏代。在传说中五帝之首的黄帝时代，华夏民族远未发明金属冶铸。商代的乐钟编铙，均为三件成套，出土数十例无一例外；西周初年发明的甬钟，最初也是两三件成组，在西周中期以后才发展为8件组、16件套的规模；而且整个先秦时期，罕有十二件套编钟的情形出现。这类不经之说，诚如史学家顾颉刚所谓的“层累”而来。“层累”，是指中国传统的古史，是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层层堆积形成的。说得很形象，不过还不精确：这种代代相传，不仅有层累，还有传承者的筛选。那位伶伦与荣将一起“铸十二钟”，于传说貌合“层累”，于史实却是子虚乌有。《吕氏春秋》的这些记述，无可稽考的时代，扑朔迷离的人物，荒诞不经的事迹，实难以作为信史看待，数千年来却成为中国史前音乐历史主体的不二法则；仍在今天音乐院校的课堂上、教授们的讲坛上畅行无阻。

“五四”以后，叶伯和等首开中国音乐史专著之先河。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将中国音乐史分为4个时代，其前两个时代分别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以前的“发明时代”，从黄帝时代到周代的“进化时代”③。其主要内容只能借助于这样的神话与传说。一方面，当时的史家的确还停留在这样的认识层面；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以“引经据典”为原则。有经可引，有典可稽，即可成史。借助于古代的神话传说构建中国音乐的史前史，轻车熟路，是一条无须承担风险的捷径。对于遥远的蒙昧时代，在当时我们究竟知道多少？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未久，史料贫乏；文献经典的相关记述，几乎是“史料”的唯一来源。故19世纪以前，这样的神话传说始终是人们公认

贾湖骨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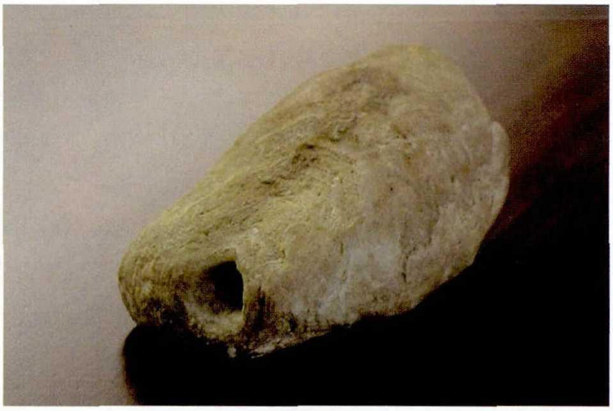
的中国音乐的“史前史”。其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们的音乐史前史仍在拄着神话传说这根拐棍彳亍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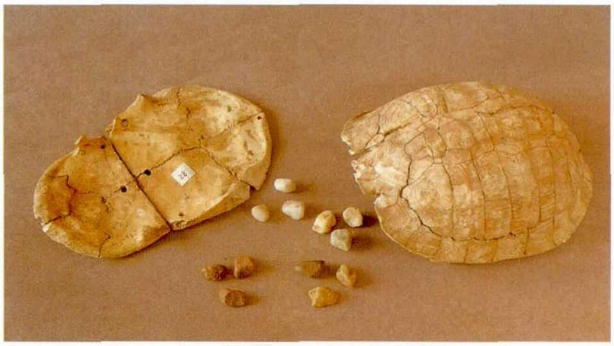
随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勃兴，大量的音乐文物及相关考古资料面世，引起了一些独具慧眼的音乐史学家的关注。杨荫浏很早就认识到单纯依靠文献史料治史的局限，在其一生中始终不懈地关注音乐考古的新发现。1943年底，他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完成了他一生中首部中国音乐通史著作《中国音乐史纲》[4]。《史纲》实际上是从以商周社会为背景的、所谓的“周前”开始的。书中“上古时期的乐器”及“周前的乐器”等篇章，他已经引用了当时一些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如唐兰的《古乐器小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8月关于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编钟的考证以及殷墟发掘资料等[5]。不过在描述史前社会乐音生活的面貌时，所谓“初民的乐舞”，仅仅引用了《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葛天氏”“阴康氏”和《礼记·郊特牲》中的“伊耆氏”等三则的远古传说[6]。

建国以后，他更多地关注到自《史纲》以后的音乐考古学发现和成果；如他在研究马王堆一号汉墓的瑟时，找出了墓葬刚被打开、尚未被扰动时的瑟的照片，仔细地研究了上面弦码摆放的规律，再根据照片上乐器和实物的比例，计算出瑟上原来瑟码的具体位置，又根据瑟和筝定弦的一般规律，判断出这瑟是按照五声音阶定弦的，从而揭示出瑟这种久已失传的古乐器以及相关汉代音乐本体方面的重要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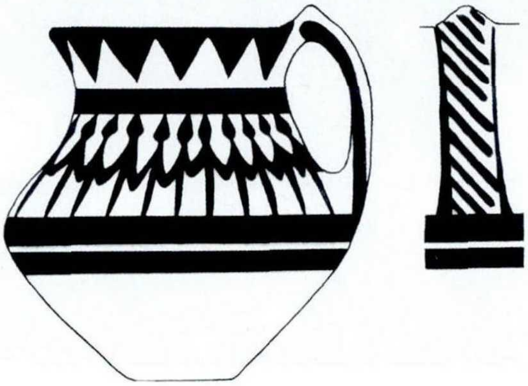
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中国音乐史学上至今难以超越的巨著[7]。《史稿》专门设立了“远古”编，将对于史前社会乐音生活的研究从《史纲》的“周前”概念中独立出来，并以“概况”“音乐的起源”“传说中的远古音乐”“原始时代的乐器”为题进行了论述。一方面，荫浏先生在对于史前时期的音乐视野开阔了许多，特别是在史料的运用上，向音乐考古方向进一步拓展，从而在史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实证性等方面就之前著《史纲》获得了无可怀疑的超越。另一方面，“远古编”仅在“原始时代的乐器”中就引述了如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陶钟、甘肃临洮寺洼山铜铃、江苏吴县梅堰骨哨、山西万泉县荆村陶埙等考古发掘资料。其治史，传统文献史料占据着绝对地位，基本内容还是着重对文献的引用和解读，“引经据典”仍是他最根本的撰史方法。

音乐史学家李纯一早于50年代初就开始了音乐考古方面的工作。作者多年致力于上古（远古至汉）乐器的系统研究，1994年李纯一的《先秦音乐史》出版，其前身《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发表于1957年，长期以来一


奉节石哨


河南舞阳贾湖龟甲摇响器

山东莒县陵阳河陶角


甘肃酒泉干骨崖舞蹈纹陶罐

直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1990年起，作者以写《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一书时所获得的大量考古学方面的资料为基础，重新撰写本书，更名《先秦音乐史》[8]。该书设立了首章《远古和夏代的音乐》，在其中《远古至夏代的乐器》一节中，充实了大量的音乐考古史料。不过在此之外，作者则以《远古音乐神话传说》和《夏代的神话传说》为题，仍以《吕氏春秋·古乐》等文献，作为对远古及夏代社会音乐生活描述的主体内容。1996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他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9]，又是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的一部学术巨著。书中不乏从音乐学角度提出的、不同于考古界陈说的新见，为中国音乐的史前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参考。

杨荫浏《史稿》之后的三十余年间，出版的中国音乐通史类著作达数十部之多；其中或为教学之需，或为职称所累，不乏应景之作，学术上、理论上有较大开拓者寥寥，治史方法也未有根本的改变。但有一点倾向值得注意：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越来越关注地下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史料，对中国音乐史前史研究的特殊意义。如音乐史学家刘再生近年研究成果丰硕，其著作广泛地采用最新的音乐考古学成果，值得关注[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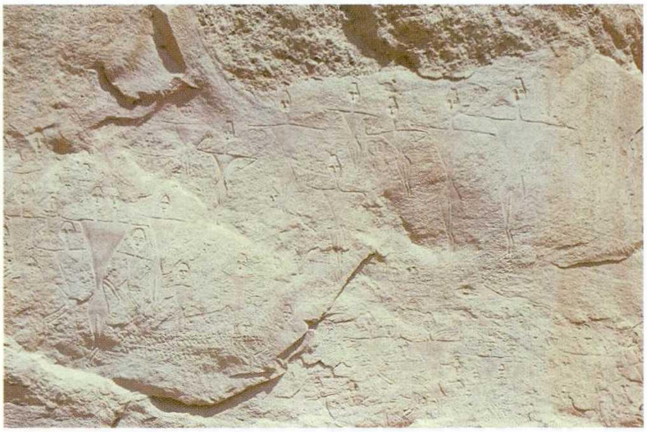
1978年湖北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不仅导致了人们对传统古代音乐史的重新认识，也带动史前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热潮获得空前的提升。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陆续发现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七音孔骨笛，更让学者们面对这样一些活生生的实证，无法视而不见。贾湖骨笛从根本上撼动了建筑在神话传说基础上的一部中国音乐史前史。其中的七音孔骨笛的年代是距今8200—8600年，大大超越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距今约四五千年）。上述黄帝命伶伦与荣将一起“铸十二钟”的事迹，更已是青铜时代后期的人的附会，距今不会超过3000年。在迄今为止发现的一切史前音乐文化的物证中，贾湖骨笛无论在年代及可靠性方面，还是在艺术成就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史前时期远远走在世界的前面。

事实似乎更让人吃惊。2001至2002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市奉节县文物管理所组建的洞穴考察队，对长江三峡奉节县云雾乡兴隆洞进行了考察和试掘，出土了距今约有十四万年之遥的石哨。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为古远的旧石器时代音乐文物，它的发现，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整个人类音乐文明源头中一个耀眼的亮点[11]。因它出土于长江三峡的奉节县，笔者命名为“奉节石哨”。

目前，中国音乐的史前史还滞留在零星的研究阶段，对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尚未建立起系统的认识。尽管如此，中国在这一时期的音乐考古较之此前的几乎空白，已经积累起可观的发掘资料，有了构建系统框架的基础。

在裴李岗文化中，除了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七音孔骨笛之外，还可见到颇具特色的贾湖龟甲摇响器及河南汝州中山寨骨笛、长葛石固骨哨等。仰韶文化出土的音乐文物十分丰富，有摇响器、陶埙、陶角、陶铃等一大批，如陕西临潼姜寨摇响器和陶埙、华县井家堡陶角，郑州大河村陶铃等。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音乐文物也不少，仰韶文化中所见的音乐文物陶角和陶铃，这里也多有发现，如山东莒县陵阳河陶角、江苏邳县刘林陶铃等。另外还出现了富有特色的莒县陵阳河笛柄杯、山东泰安大汶口陶鼓等。在马家窑文化中，除了发现

甘肃玉门火烧沟陶埙



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

摇响器、陶鼓，又发现了一些图像类音乐文物，如著名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舞人彩陶盆、甘肃酒泉干骨崖舞蹈纹陶罐等，其中的陶腰鼓更是别具一格。

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音乐文物最为丰富。除了以上所及各类，还出土了丰富的特磬，发现了最早的金属乐器。山西襄汾陶寺3296号墓纯铜铃，为夏商青铜乐器的初萌至繁荣开了先河。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可能相关，所见青铜合金铸制的铜铃多枚，冶铸工艺出现了明显的提高。还见到了极为难得的木腔鼍鼓，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木鼓。二里头3号墓的石磬也表现出重要的进步。在河源及西北诸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及长江流域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各类音乐文物也是琳琅满目，如青海省都兰诺木洪骨哨、骨笛，甘肃玉门火烧沟陶埙、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铜铃、甘肃庄浪小河村陶鼓、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齐家文化石磬等。

还有不能不提及的图像类音乐文物：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甘肃嘉峪关北黑山列舞岩画等，让人目不暇接[12]。

远古的这些音乐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从14万年前的奉节石哨、八九千年前的贾湖骨笛到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丰繁的音乐考古发现，已可粗略地勾勒出中国音乐史前史的基本框架。

远古的这些音乐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却不是唯一的对象。远古时期的音乐也并非如今天所谓的作为艺术的音乐，所以，出土有这些音乐文物的考古学文化本身也值得进行全面的关注。对先民的社会生活，生产力的提高、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有全面观照，这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音乐生活至关重要。对于了解人类音乐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至关重要。比如贾湖人制作出可以吹奏七声音阶的骨笛，无疑是人类音乐文明史上的伟大成果，但这一成果的出现并非偶然。从贾湖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贾湖人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丰富的文明迹象。如农牧业：贾湖遗址出土了距今九千年左右的人类栽培水稻的炭化标本；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家畜—猪和狗的驯养；手工业：在贾湖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制陶与纺织业的产生；原始文字：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雏形—贾湖契刻符号的发明应用；社会形态：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及原始宗教巫术—身佩骨笛和龟甲摇响器的巫师的出现等，均显示出这是一个具有相当高度的人类文化积聚的社会，中华早期文明的一个真实缩影。

进一步考察当代中国考古学有关华夏文明的探索，早已超越了传统“黄河文明”单一认识。在长江流域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这里与“黄河文明”一样，同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例如栽培稻及稻作文化的出现。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13]、湖南零陵地区道县寿雁镇玉蟾岩，均发现了大量栽培稻标本，距今可达1.5—2.2万年[14]。东亚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及其周边广大地区，可能是迄今所知人类最早的文明源头。高度发达的音乐文明的贾湖文化，约在距今的万年前后，已经孕育于亚洲东部的淮河流域，它正位于东亚的两河之间，是这个文明的核心地区之一。贾湖骨笛和贾湖人七声音阶观念的研究，具有最醒目的标志性意义！“音阶观念”较之人类的物质文明，问题是最抽象的，学术层次是最高的。它可能成为中华音乐文明乃至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的突破口！可能改写音乐艺术的史前史，建起一座人类音乐文明史的丰碑！

但音乐文物自身不会说话，它需要靠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解读。对史前音乐文物的解读，还远没有充分展开，而且亟待深入、永无止境！

如贾湖骨笛的研究。1987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史学家黄翔鹏等人，对编号为M282：20号一支骨笛进行了测音研究，并在《文物》杂志发表了迄今关于贾湖骨笛最权威的研究报告。报告称：“……我们的最后结论认为，这支骨笛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徵调音阶[15]。”经黄翔鹏等人解读，表明中华民族的先祖早在距今八千多年前，已经发明并广泛使用着可以吹奏七声音阶的乐器！

又如奉节石哨。不过是一截残断的钟乳石，如果没有中国科学院地质学专家谭明博士精辟的逻辑推理，实在难以将经历14万年漫长岁月的磨蚀已毫无人类加工痕迹的这枚石核，与人类的智力活动扯上关系。谭明运用“差异风化”的原理，结合奉节石哨所处的地层环境可能接触的自然力，证明了它不可能不是经人类加工而成的一件发声器械！

不过同样如贾湖骨笛，自出土的三十余年来，国际学界的反应并不强烈。其原因何在？我们的研究解读，我们的新闻报道，似乎是一贴没有标签的药方。国际学界冷眼以对，不失为一种理智的态度！贾湖骨笛重大的学术意义应该在于：贾湖人是否已经具备了“七声音阶”的观念？他们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制作出了这些“可以吹奏”七声音阶的乐器吗？显然，以往的研究并未触及这个核心问题。黄翔鹏等人的研究结

论仅来自于其中的一支骨笛。面对今天已发现的40多支骨笛，还远远够不上一个全面、科学的结论。甚至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尚未论及。如贾湖骨笛的七孔加上筒音应该是“八孔”应“八声”？何以认定是“七孔”“七声”？笔者借助肖兴华先生已测试的6支骨笛的数据⑱，发现骨笛的各音孔（包括筒音在内）实际发出的音列并不对应于音阶的七声，而且均超越于八度音程，6笛所发音列也各不相同。这种现象显然有悖于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竹笛，而我们的研究者却并未提及。

一方面，人类如何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艰难的抽象思维“发明”或认知了音阶的概念？贾湖骨笛究竟在这个过程中保留下来了多少蛛丝马迹，达到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可否由之判定或否定，贾湖人已经有了音阶的观念，甚至已经建立了“七声音阶”的概念？这对中华民族的音乐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起源研究都有着莫大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贾湖人的“七声音阶观念”还有待论证，但出土的骨笛是迄今考古所见人类最早的、可以吹奏七声音阶并有明确的七孔规范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而且，在四十多支七音孔制式的骨笛上，有关音乐中音阶中“七”的观念被反复强调，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它隐含着音乐中“七声音阶观念”这一人类重大抽象思维成果，已经诞生在距今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可能性。当年黄翔鹏等人在对第二支骨笛进行吹奏时，出现了开裂的声音，研究因此戛然而止。显然，科学研究与文物保护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文物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解决当年文物保护方面的难题。2012年，《中国音乐学》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大学方晓阳教授等人的论文《贾湖骨笛的精确复原研究》⑯，介绍了利用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CT技术对贾湖骨笛进行无损扫描，然后将扫描得到的二维图像进行三维重建，最后采用3D打印－紫外激光固化快速成形技术，首次制作出了迄今为止精度最高的贾湖骨笛复制品⑰。有关骨笛的全面研究已成为可能！

笔者无意否定文献史料在治史中的重要作用。仅希望能对传统音乐史家屡屡引述的、作为“史前史”主要内容的文献，诸如《吕氏春秋》等，客观地指出其局限所在。必须强调的是，史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科学，远古的神话传说肯定不能等同于历史。在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的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音乐文物是历史上人类社会乐音生活留下的物证，是研究音乐史前史的唯一的直接史料。但神话传说被看做是“历史的影子”。既是影子，也自有历史的轮廓。当我们掌握的史前音乐考古史料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再度神游太古，也是重新发掘这些“影子”史料的合理内核的时候。《吕氏春秋》等文献将被重新解读，发掘出其新的史前的史料价值；而将它们生吞活剥、强行灌输给我们的子弟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

① 《吕氏春秋 · 仲夏纪 · 古乐》，《诸子集成6》，上海书店1976年7月影印版第50、51页。

② 王参见注1。

③ 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年出版的上卷，作者自己发行。上世纪80年代其下卷被发现，并发表于《音乐探索》1988年第1期。

④ 杨荫浏的这部《中国音乐史纲》，有1944年1月油印本、上海万叶书店1952年、1953年版本及2009年12月江苏文艺出版社《杨荫浏全集》本。

⑤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杨荫浏全集》第1卷第51、52、54、56、61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⑥ 同⑤，第26、27页。

⑦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⑧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⑨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⑩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方建军《考古学中的音乐与音乐史中的考古》，《人民音乐》2014年第7期。

⑪ 2003年4月1日的《北京晚报》头版载记者孙海东文章：“奉节发现14万年前石哨”，“这一发现可能改写人类音乐史”。报道称，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王子初介绍，“三峡奉节石哨的发现，可能会把人类原始音乐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至14万年以前。”同年5月23日《北京晨报》第九版相继报道：“14万年前石哨依然清晰——三峡发现最早乐器”。

⑫ 参见黄翔鹏、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相关各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起陆续出版。

⑬ 《95全国考古新发现》，《光明日报》1996年3月26日。

⑭ 《人民日报》1996年4月3日海外版。

⑮ 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

⑯ 方晓阳、邵锜、夏季、王昌燧、潘伟斌、韩庆元《贾湖骨笛的精确复原研究》，《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2期。

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10520403）。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邵琦以此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获得好评。

⑱ 相关的测音数据均可参见肖兴华《骨笛研究》，载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9－1002页。

王子初 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晓倩）